

潘美月 · 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献研究辑刊

初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35冊

唐朝漢語景教文獻研究

曾陽晴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唐朝漢語景教文獻研究／曾陽晴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民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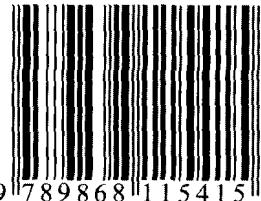
頁 2 + 232 頁；19×26 公分（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第 35 冊）
ISBN：986-81154-1-8（精裝）

1. 景教 - 教義 2. 景教 - 中國 - 唐 (618-907)

246.18

94018630

ISBN 986-81154-1-8



9 789868 115415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 第三五冊

ISBN : 986-81154-1-8

唐朝漢語景教文獻研究

作 者 曾陽晴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5 年 12 月

定 價 初編 40 冊（精裝）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唐朝漢語景教文獻研究

曾陽晴 著

作者簡介

曾陽晴 1962 年生 台灣大學中文所畢。《無善無惡的理想道德主義——王龍溪思想研究》台大文史叢刊 91 出版。1986 年以《朱熹與王船山對西銘詮釋觀點比較研究》獲得台大中文系第一屆論文比賽首獎，1990 刊登於台大中文學報第二期。清華大學博士班畢。2003《唐朝景教文獻思想研究》；2005《小島文書真偽考——李盛鐸氏舊藏敦煌景教文獻二種辨偽再商榷》刊登於中原學報 33 卷第二期。

提 要

歷來學者稱《大聖通真歸法讚》與《宣元至本經》為小島文書，近年來有學者考證二經乃偽造的敦煌文書，我們將重新探討此一問題，也從比較老子的道與基督的道重新定位《宣元至本經》。經由外緣史料的考證與內緣思想的判教，我們知道上述二經未必為偽。

本論文對目前可見的漢語景教文獻全面進行系統神學的分析：包括神論（三位一體論）、救贖論、基督論、聖靈論、人論、末世論，使我們可以對唐代進入中國長安的景教的思想和神學內容，有一個概括性的掌握，以便當我們進行中、下卷景教進入中國所遭遇到的各式各樣的處境化問題的分析時，有一個基本且實際的討論架構與基礎。

神學術語成為引介景教進入中國的語言最前線，我們以涉入借用佛道教語言和表述形式最深《志玄安樂經》、《宣元本經》與《宣元至本經》三個經典作為分析範例：發現景教經典大量借用佛道教語言和表述形式，除了引起極大的困擾之外，也看出漢語主方語言的能動作用；另一方面，景教的神學術語創造了屬景教自身的新語言，必須透過中介作用才得以將一個全然陌生的外來名字的意義表達出來。

漢語的景教經典中對於《聖經》的翻譯策略，在內容的選擇上以耶穌的教導和一生行傳（包括受難釘死）為主，在翻譯的操作策略上則以唐朝中國讀者的需求為主，亦即儘量降低認識信仰的障礙，甚至挪用、改寫、重編的方式，進行基督教在中國的最初《聖經》與神學作品的翻譯。

景教從波斯千里迢迢來到長安，帶來的是一個新的宗教，也帶進一套新的倫理規範。這一套倫理規範與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在某些議題上產生了衝突，特別是「神權 vs. 君權」與「不拜祖先」這兩個重大問題上。奇特的是在後世明、清兩代甚至激起反教運動的這兩個重大議題，竟然未在唐朝政治和社會引發衝突，其中特別是一直與統治階層保持良好關係是景教能夠蓬勃運作與發展的主因。

唐代景教輸入的宣教策略與處境化的實踐，亦即景教的宣教如何跨越語言、文化的難題，我們將就聖像崇拜的神學衝突，與翻譯上尋找唐代讀者對於景教文本的閱讀切入點，深入分析其宣教成功與失敗的原因：我們發現為了宣教的原因，從阿羅本以降即制定與統治階層保持良好互動，因此產生犧牲信條（不拜偶像）而過度尊君，以致後來武宗滅佛遭遇重大挫折就一蹶不振；另一方面翻譯事業也使得信徒能用漢語進入信仰世界——這應該是處境化宣教最成功的一點。



目

錄

上卷 唐代景教文本分析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唐朝景教的輸入背景與文獻的發現	1
第二節 景教文獻研究評述	4
第二章 小島文書真偽考	7
第一節 小島文書二經的真偽	8
第二節 重新定位《宣元至本經》	23
第三節 一個可疑的人物	35
第三章 景教文獻的思想解讀與綜觀	39
第一節 景教的神論	41
第二節 景教救贖論——帶入上帝的生命中	51
第三節 景教的基督論——東西神學的分與合	58
第四節 景教的聖靈論	65
第五節 景教的人論——靈魂的位置	68
第六節 景教的末世論——天堂裡的遊戲	82

中卷 唐代景教文獻的漢語語境化研究

第四章 景教文獻的語言與界限	87
第一節 兩篇三教同源的怪經典	87
第二節 土來馬赫的異端判準	91
第三節 語意價值的轉投資	96
第四節 中毒的文本	107
第五節 景教的新語言	111

第五章 景教文獻的跨語際行為——翻譯	119
第一節 翻譯：策略性選擇的結果	121
第二節 《聖經》的漢語初譯	128
第三節 漢語最初的《新約》譯文	141
第四節 讀者需求導向的翻譯策略	149
第五節 漢語版《天使頌》初譯	157
 下卷 唐代景教的處境化策略	
第六章 景教倫理學的處境衝突	161
第一節 景教倫理學	161
第二節 基督教的倫理關切	177
第三節 歷史上景教引發的倫理衝突	179
第七章 景教宣教策略的處境化選擇與結果	189
第一節 神學與文化的衝突	191
第二節 翻譯與宣教	197
第三節 景教經典整體觀	210
第八章 結 語	215
第一節 唐代各宗教宣教比較	215
第二節 爭奪生命意義的詮釋權：赤裸裸的鬥爭	218
第三節 新宗教的潛在力量	224
參考書目	227

上卷 唐代景教文本分析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唐朝景教的輸入背景與文獻的發現

景教於唐太宗時（貞觀九年，635）傳入中國，後於唐武宗滅佛時（845），連同祆教、摩尼教一起被滅，景教在唐代流傳的真實狀況於是湮滅不得知。直到明天啟初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從碑文我們對唐代的景教有了初步的認識；又經過近三百年，到了公元 1908 年至 1949 年陸續發現與公布的八篇景教經典與頌文，使我們對景教在唐代的信仰內容有了更進一步的、推論性的瞭解。

景教其實是基督教的一支，源出敘利亞，經波斯傳入中國，《唐會要》卷 49 載唐玄宗詔文曰：「天寶四年（745）九年詔曰：『波斯景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此處大秦所指乃現今敘利亞，教派源自第五世紀被貶爲異端的聶斯多留（Nestorius）主教。

聶斯多畱生於公元 381 年，出生地爲幼發拉底河區域（Euphratesian）敘利亞革爾曼尼西亞（Germanicia），公元 428 年被任命爲康斯坦丁堡主教，後因爲聖母瑪利亞的地位問題（他反對 theotokos「神之母」這個字），以及基督的神人二性的神學問題，與亞歷山大宗主教區利羅（Cyril of Alexandria）產生對立，在公元 431 年舉行的以弗所會議（Council of Ephesus）上聶斯多畱被撤職，視爲異端，遣往安提阿（Antioch），在流放埃及時於公元 451 年逝世。

聶斯多畱被流放後，支持者越過邊境遷往波斯，以尼斯比（Nisibis）作爲其活

動中心，波斯教會（Persian church）於公元 486 年正式成為信奉聶斯多留主義的教會。後雖受到回教的逼迫，依然在唐代傳入中國成為景教。

據漢語的景教經典《尊經》的記載，來到中國長安的景教宣教士為了宣揚景教的教義，著手翻譯了一些敘利亞文的景教經典；另外，為了適合中國當地教徒與潛在信徒的實際狀況和需求，他們也自行書寫一部分經典，這些經典的名稱在整理之後記載在《尊經》之中。然而按照現今出土的漢語景教文獻來看，許多篇景教文獻是《尊經》中沒記載的（特別是早期的作品），顯然在唐亡之後才寫下《尊經》的作者已然看不到多篇早期的漢語景教文獻——這應該與武宗滅佛有密切關係。

除了景教碑文外，其餘的七、八篇經典的發現，蓋與英、法探險家斯坦因（Aurel Stein）、伯希和（P. Pelliot）有絕大關係。他二人分別於光緒末年（1907～8, 1909）先後至敦煌鳴沙山千佛洞搜括藝術品與寫卷，宣統二年（1910）滿清學部大臣才令甘肅總督、轉令敦煌縣知縣將石室殘留寫卷提運北京，其中吏民經手而獲寫卷者不少，因此之故，景教經典分藏各地（註 1）。

目前可以看到的九篇漢語景教文獻，除了明代發掘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碑文之外，有些是二十世紀初在敦煌石窟發現的，有些可能是今人據敦煌寫本抄錄下來的：《序聽迷詩所經》、《一神論》、《宣元至本經》、《大聖通真歸法讚》、《志玄安樂經》、《宣元本經》、《三威蒙度讚》、《尊經》。一般而言，八篇文獻或譯或寫於初唐及中唐（除了《尊經》作於唐亡以後），大約出於阿羅本與景淨之手，大致上可分為經文與頌文兩大部分。根據翁紹軍的說法經、頌文各佔四篇：「景教八篇文典就其體裁而言，恰好四篇為頌文，四篇為經文（註 2）。」四篇經文為：《序聽迷詩所經》、《一神論》、《宣元至本經》、《志玄安樂經》（事實上少了《宣元本經》），所談論的內容則包括了基督教的神論、人論、宇宙論、倫理學等內容。

《一神論》為日本富岡氏收藏 1918 年首先由羽田亨博士披露；而另一篇有名的早期景教經典《序聽迷詩所經》為日本高楠順次郎所收藏，1926 年由羽田亨刊佈；《宣元至本經》、《大聖通真歸法讚》則為小島靖所藏，1943 年在天津得著，1949 年由佐博好郎發表；《志玄安樂經》、《宣元本經》則是藏書家李盛鐸所藏；最後《三威蒙度讚》、《尊經》則是法國伯希和博士得之於敦煌的寫本。

[註 1] 參朱謙之，《中國景教》，1993，（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112～129；羅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國學社，1966），頁 31～35。

[註 2] 翁紹軍，《漢語景教文典詮釋》，（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1995），頁 21。

對於這些經卷的真偽，學者持不同的意見，榮新江和林悟殊二人合著的〈所謂李氏舊藏敦煌景教文獻二種辨偽〉對於《宣元至本經》、《大聖通真歸法讚》兩篇經文的真偽有很豐富的考證^(註3)，值得我們重新思想這兩篇經典的定位問題。我們將在第三章〈小島文書真偽考〉中詳細討論此一問題。

問題是無論經或頌，在語言使用與操作上，令人產生極大的困擾：亦即使用了大量的佛教與道教的術語和專有名詞。固然，在此之前基督教最重要的經典《聖經》尚未有漢文譯本，因此景教經典中充斥佛、道教專有名詞，無法被看作是「取代」基督教的專有名詞，因為此時漢語中的基督教專有名詞尚未成形，根本談不上取代的問題。然而，這依然是一個很大的困擾——我認為這是研究唐代漢語景教文獻思想所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亦即其經典的漢語語境化的問題。

在本論文中，我的計畫將分為三個部分：上、中、下三卷。

上卷主要解析：一、小島文書真偽考：我們將先面對景教經文中最被質疑的兩部經典《大聖通真歸法讚》與《宣元至本經》的真偽問題，進一步討論道教與漢語語境的關係，比較老子的道與基督的道，另外兼及呂祖與景教的關係。二、唐代景教文獻的神學觀：耙梳這幾篇文獻所論述及的各個神學範疇的內容與觀念，包括三一神論、基督論、聖靈論、救贖論、人論與景教的末世論。

中卷則就唐代景教文獻的漢語語境問題進行研究：一、景教文獻的語言與界限：專有名詞的借用與命名——專有名詞成為引介景教進入中國的最前鋒，然而卻引起極大的困擾；另包括景教經典兩階段論，詮釋的假設，中毒的文本，景教的新語言。二、景教文獻的跨語際行為——聖經的最初漢譯：漢語的景教經典中對於聖經的翻譯——最早的新約翻譯，到底採取什麼樣的選擇策略與翻譯策略？這樣的策略又代表什麼意義？以及景教聖經漢譯的評估。

下卷則針對景教宣教的處境化問題進行處理：一、景教文獻的倫理處境化問題：景教從波斯東來，帶來一個新的宗教，也帶進一套新的倫理規範。這一套倫理規範與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在某些議題上產生了衝突，特別是「神權 vs. 君權」與「不拜祖先」這兩個重大問題上。在「神權 vs. 君權」的議題上，景教宣教士採取妥協的策略以確保皇帝在政治上的支持；在「不拜祖先」的議題上，從文獻的考察，知道他們堅持信仰的原則，卻意外地未引發激烈的反對聲浪。二、景教文獻的處境化理論：景教的宣教如何跨越語言、文化的難題，唐代景教輸入的宣教

^(註3) 詳參榮新江與林悟殊合著的〈所謂李氏舊藏敦煌景教文獻二種辨偽〉，收入榮新江，《鳴沙集》，(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9)，頁 65～102。

策略與處境化的實踐，我們將談及聖像崇拜的神學衝突，真假之辯與唐代讀者的閱讀切入點，以及相當嚴重的倫理學衝突（漢語景教文獻中的基督教倫理問題與中國倫理觀念的碰撞和衝突）。

第二節 景教文獻研究評述

對於唐朝景教文獻全面的思想研究這樣一個研究工作，一本必需的注解參考書是不可少的，截至目前為止翁紹軍的《漢語景教文典詮釋》^(註4)，可說是最基本的注釋書。此書注解文本之前的一篇導論，對漢語景教文典有一個概括性的全面說明；其注解多為綜合前賢的研究成果，少有創見。

就唐朝景教的文獻的歷史研究，二十世紀早期的 A. C. 穆爾、佐伯好郎，中期的馮承鈞、龔天民、羅香林、朱謙之，與最近的榮新江林悟殊，都是相當重要的學者。

A. C. 穆爾的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公元 1550 年前的中國基督教》)^(註5)，對於唐朝的景教歷史有一概要的論述，其最重要的貢獻應該就是把景教碑文、《三威蒙度讚》翻譯成英文，且加以注解。另外 A. C. 穆爾的英文版 *Nestorians in China* (《中國景教》)^(註6)，是他在 1940 年在倫敦中國學社 (The China Society) 所發表的演講，主要是一方面補充其前作《公元 1550 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另一方面是修正他自己與佐伯好郎所犯下的一些錯誤。

佐伯好郎英文版的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中國景教的文獻與遺物》)^(註7)，是一本相當全備的著作，對於各個景教經典都能就兼顧歷史考證、語言研究與思想探討三方面，且分別進行英譯的工作，另外也把景教的相關資料羅列考證，對於學者助益頗大。

馮承鈞的《景教碑考》^(註8)，則從各個觀點與層面，對於景教碑作一全面性的歷史考證研究，不僅援引在他之前的諸位學者的相關文本，並加以按語，可讓讀者對景教碑有一歷史性的認識。

[註 4] 翁紹軍，《漢語景教文典詮釋》，(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1995 年)。

[註 5] Moule, A. C. (穆爾)，1930,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New York: MacMillan Co.

[註 6] Moule, A. C. (穆爾)，1940, *Nestorians in China*, Hertford: Stephen Austin & Sons, Ltd.

[註 7] Saeki, P. Y. (佐伯好郎) 1951,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The Maruzen Co. Ltd.

[註 8] 馮承鈞，《景教碑考》，(台北：臺灣商務，臺一版，1960 年)。

龔天民留學東瀛，師事佐伯好郎，於佛學亦有造詣，其《唐朝基督教之研究》（註 9），對於唐景教歷史與經典的介紹相當概略，反倒是花了許多力氣針對景教文本與佛教語言的糾纏問題多所著墨。

羅香林的《唐元二代之景教》（註 10），分序篇與上、下篇，序篇論述唐元二代的景教歷史與遺物問題——這一部分可說沿襲穆爾與佐伯好郎的研究進路，發明不多；而在其上篇中，針對唐朝歷史上的幾個不太明顯的資料，深入追索其中與景教有關的歷史意義——這一部分可說是看見羅香林在唐史上的造詣與考證功力。

另外一本不可忽視的著作就是朱謙之的《中國景教》（註 11），此書原稿完成於 1968 年，可看出朱氏的學養，不只詳加說明景教（聶斯多留派）在基督教歷史的沿革，且對其所處的歷史環境，旁及於唐朝其他宗教的比較關係均涉及，讓讀者對景教有一個更加全面的歷史圖像。

榮新江是重要的敦煌學專家，他的《鳴沙集》（註 12）是從敦煌學的觀點，對景教進行深入的考證研究，其中與林悟殊合著的〈所謂李氏舊藏敦煌景教文獻二種辨僞〉與他自著的〈李盛鐸藏敦煌寫卷的真與僞〉兩篇論文，旁徵博引，對於所謂的小島文書有關鍵性的考證。

至於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當屬林悟殊的《唐朝景教再研究》（註 13），這本剛出版的研究作品，分兩部分：一是傳播篇，主要針對景教寺院的考證與其宣教策略問題——特別是後者能夠擴大視野，從唐朝三夷教的比較研究入手，讓景教宣教的歷史參考架構更加清楚；二是經文篇，針對所謂敦煌出土的經文進行考證工作。

另外陳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論著八種）上下》（註 14），特別是上冊中有關祆教、摩尼教、回教傳入中國的考證，學術紮實，引論清晰，對於景教所處的唐朝宗教環境的理解相當有幫助。另外莫菲特（S.H. Moffett）的《亞洲基督教史》（註 15），則對於聶斯多留派（景教）東來的路線與歷史，有非常詳盡

[註 9] 龔天民，《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輔導出版社，1960 年）。

[註 10] 羅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國學社，1966 年）。

[註 11] 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註 12] 榮新江 B，《鳴沙集》，（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9 年）。

[註 13] 林悟殊 B，《唐朝景教再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註 14]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論著八種）上下》，（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註 15] 莫菲特（S.H. Moffett），《亞洲基督教史》，（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0 年）。

的描述。

關於期刊方面，旅法學者吳其昱的〈景教三威蒙度贊研究〉（註 16），比對了《三威蒙度贊》與其敘利亞原文《天使頌》的翻譯——這是目前可以找到原文的一篇景教經典，對於景教經典的翻譯研究有基礎性的貢獻。

趙璧楚的〈就景教碑及其文獻試探唐代景教本色化〉（註 17），對於《序聽迷詩所經》的題目，提出不少創新的看法，可惜的是不明白歷史語言學的重要性，許多音韻的問題離開了唐朝的語境（中古音），失去其論點的有效性。

最後的是黃夏年的〈景經《一神論》之「魂魄」初探〉（註 18），從佛教的語言掌握入手，解釋《一神論》中的「魂魄」問題，算是實際進入文本從事注解的研究工作。

至於本論文則希望能夠達到幾個目的：一是實際進入景教諸經典的文本，作一全面性的語言解釋與神學詮釋的工作；二是以第一部分的工作為基礎，對於景教經典的跨語際實踐進行分析，亦即從其翻譯的實際運作，進行釐清其與唐朝的文化與語境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三是對於景教進入中國所面臨到的處境化問題進行分析，包括倫理與宣教兩方面的處境問題，將之置於唐朝的歷史脈絡中，找出景教宣教的策略與操作原則。

[註 16] 吳其昱，〈景教三威蒙度贊研究〉，《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57 本第 3 份)。

[註 17] 趙璧楚，〈就景教碑及其文獻試探唐代景教本色化〉，1990 年，林治平編：《基督教與中國本色化》，(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0 年)，頁 173～93。

[註 18] 黃夏年的，〈景經《一神論》之「魂魄」初探〉，《基督宗教研究》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 10 月)，頁 446～460。

第二章 小島文書真偽考

前 言

在景教文獻中，《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與《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贊》被佐伯好郎稱為是小島文書（註1），他認為：「無庸贅言，這些文書末題記的日期、抄錄者的名字與地名，勢必對中國景教教會史的理解大有助益（註2）。」自兩件寫本公佈後，無論對這兩篇文獻的解釋或意見如何，除了比較早期的學者朱謙之懷疑其為偽造之外，幾乎所有的學者都將此二經視為景教的珍貴原始資料，當然也都不懷疑其為偽造，一直到1991年榮新江與林悟殊二人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著了〈所謂李氏舊藏敦煌景教文獻二種辨偽〉之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大聖通真歸法贊》才被高度質疑為偽造，且兩位作者在多處發表（註3），足見二位學者的重視，且文末附語提及多位學者，隱隱然有為其背書之意，儼然其意見已成為定見——這對於後來的研究者造成了一個障礙——如果不處理此一問題，似乎就不能進一步研究《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大聖通真歸法贊》二經。

〔註1〕佐伯氏在1949年出版的《清朝基督教之研究》首度論及小島文書，後於1951年出版的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的再版序又說明了一次情況。參佐伯好郎（頁Y. Saeki）《中國之景教文獻及其遺跡》(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東京，The Maruzen Co. Ltd., 1951)，頁1~3；榮新江，《鳴沙集》，(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9)，頁66~7。

〔註2〕佐伯好郎，1951，頁2。

〔註3〕彼文最初發表於1992年饒宗頤主編的《九州學刊》第四卷第四期且二人也分別收入其個別專著榮新江將其收於《鳴沙集》，(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9)，頁66~113；林悟殊則收錄於《唐朝景教再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156~222。

第一節 小島文書二經的真偽

唐朝景教經典中，有兩篇命名幾乎相同僅一字之差，即《宣元本經》、《宣元至本經》，這兩篇經典一出於李盛鐸的收藏，即《宣元本經》；另一出於小島靖的收藏，即《宣元至本經》。《宣元至本經》被朱謙之高度質疑為《老子》62章的注解，甚至於斷為偽作，而《宣元本經》甚至更糟：「《宣元思本經》……屬偽作，蓋乃略通景教碑文之書賈偽作以謀利者……蓋《宣元思本經》是景教文書；而《宣元至本經》則為道教的信徒所作，以注釋《老子道德經》者……此開元五年法徒張駒所傳寫之《宣元至本經》，作為景教文書看，則屬於偽作，張駒無疑是道教信徒而住於沙洲大秦寺，故有此誤會（註4）」。

真是如此嗎？稍早於朱謙之《中國景教》（原作完成於1966）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唐朝基督教之研究》中（1960），龔天民認為的卻正好相反：「《宣元本經》中充滿了道家氣味，文章顯得十分玄妙。但《宣元至本經》中不單沒有這些氣氛，且在規規矩矩的講〈約翰福音〉中的道的能力以及聖靈之功，並說明了信道者和不信道者的品行以及信道者的益處（註5）」。

更妙的是羅香林居然說（他以為《宣元本經》乃《宣元至本經》的前半部，原因很簡單，題目漏寫一字）：「此經所述大要與《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五章所述登山寶訓相似（註6）。」反觀翁紹軍則持相反的立場：「《宣經》中的『道』也類似道教經書中的『道』（註7）」。

同樣的兩篇經文，為什麼見解竟有如此天壤之別？先談《宣元本經》，朱謙之先是說為偽作，乃略通景教碑文者的書賈利用碑文所編造，而目的則是謀利，可是後又改口說是景教文書。其中有矛盾：若是編造偽作，就不會是景教文書。反之亦然。另一點則更為可疑：為什麼會有略通景教碑文的書商為了謀利造假？我們不禁要問：利基在哪裡？又是什麼時代的書商的作為？景教碑被埋之前，或之

[註 4] 朱謙之謂：「《宣元思本經》是景教文書，而《宣元至本經》則為道教信徒所作以注釋《老子道德經者》」，此說法仍必須經過《尊經》的驗證。《尊經》記載諸景教經文目錄，第二即為《宣元至本經》，與朱說抵觸。朱氏未說明為何《宣元至本經》會變成《宣元思本經》？景教文獻從未有《宣元「思」本經》，此經原名詳稱為《大秦景教宣元本經》，簡稱為《宣元本經》，不知以縝密廣博著稱的朱謙之何以犯錯？詳參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124～127。

[註 5] 龔天民，《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輔導出版社，1960），頁43。

[註 6] 羅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國學社，1966），頁33。

[註 7] 翁紹軍，《漢語景教文典詮釋》，（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1995），頁31。

後？被埋之前大約很困難，一方面景教經文都還在翻譯或書寫當中；一方面景教未大昌盛，且宣教士尚在，造假取信困難。若是在被埋之後，則連博學多聞的進士李之藻尚且謂「此教未之前聞」，試問即使有略通景教碑文的書商假造一篇經文，又要販售予誰？

當然，如果是在 1908 年之後，景教諸經典相繼被發現，多為海內外孤本，奇貨可居，價值不菲，那麼就有造假的理由了。李盛鐸晚年為債務之故，大量求售其藏書與敦煌卷子。1935 年當時輔大校長陳垣致胡適的信中就討論此事：「據弟所知，李氏藏有世界僅存之景教《宣元本經》……〔註 8〕。」然而當時眾學者均注目此一卷子的流向，陳垣也曾目睹此卷，還抄錄其中十行給日本學者佐伯好郎研究。在這樣的情況下，若要偽造，應該是相當高難度才是。事實上懷疑《宣元本經》為偽的大約只有朱謙之一人，且其證據薄弱，前後矛盾不具說服力。

◎五大證據的考據

敦煌學者榮新江和林悟殊二人在合著的〈所謂李氏舊藏敦煌景教文獻二種辨偽〉〔註 9〕懷疑的《宣元至本經》、《大聖通真歸法贊》二經，從五個方面的證據證其為偽，相當值得注意。這五大方面的考證在論點上又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外緣的考證，包括小島文書與李盛鐸舊藏敦煌景教經典有落差，李盛鐸的題記的剖析與其藏書印的考察三方面；二是內緣的考證，包括《宣元至本經》與基督教基本教義抵觸，而《大聖通真歸法贊》則是擬其他景教經典之作，另外最後一方面則是經末文書題記與史料有出入。事實上榮新江自己也說：「從李盛鐸藏卷的真偽來看，判別一個寫卷的真偽，最好能明瞭其來歷和傳承經過，再對紙張、書法、印鑑等外觀加以鑑別；而重要的一點是從內容上加以判斷，用寫卷本身所涉及的歷史、典籍等方面知識來檢驗它。」〔註 10〕所論前半即外緣考證，後半即內緣因素的分析。

這五大方面的論證似乎鐵證如山，然而我認為每一方面都還有可商榷的地步與空間。以下逐條詳加說明。

一、外緣問題的考證

首先，對於榮、林二人也不認為是必然的確據，我們先來考察，亦即李氏藏

〔註 8〕《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1990，頁 177，轉引自榮新江，1999，頁 71。

〔註 9〕參榮新江，1999，頁 65~102；林悟殊，《唐朝景教再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156~174。

〔註 10〕榮新江，1999，頁 114~115。

書印的問題。榮、林二人僅表示有人爲了盜賣敦煌文書，爲增加其價值，有僞造李氏藏書印的現象：「(李氏死後)傳聞李盛鐸的印記都流落在北平的舊書店中，店主凡遇舊本，便鈐上李氏的印鑑，以增高價。」雖然如此，仍無法確知《宣元至本經》、《大聖通真歸法贊》上所用印鑑是否僞造。另外一個可疑現象爲《大秦景教宣元本經》、《志玄安樂經》二經的用印狀況，前者用四個印章，後者三個、再加一個李氏題記下的「李盛鐸印」，而《宣元至本經》、《大聖通真歸法贊》二經則分別有二與三個印章。像這樣藏書印多寡的現象，我認爲頂多只是一個輔助的推論，亦即如果是真品，李盛鐸當用上更多藏書印以表重視才是；可是《宣元至本經》、《大聖通真歸法贊》二經用印似稍嫌少，看來不合常理。於是也成爲一個證其爲僞的輔證。

然而反過來想，果真《宣元至本經》、《大聖通真歸法贊》是僞造的，單爲謀利，我想用印的意思乃在增加其價值，代表李盛鐸的專業背書。對於一個造假謀利（且必然是暴利）的奸商而言，既然要用印，當然是多到一個規模，既可最有效增加其價格，又不會陷入自曝其不專業之短的危險。所以只用二、三個印顯得太過保守，至少對一個造假謀利者而言，這麼做反而不合理！

榮、林二人的考證我們要處理的第二個問題是《宣元至本經》李氏題記的造假。榮、林二人從五個方面來論證李氏題記爲僞：一是違反題記習慣（非寫於原件裱紙上，而是用小紙片書寫，黏於裱紙上）；二是《宣元至本經》有李氏題記，而更完整的《大聖通真歸法贊》價值更高卻無題記，似不合理；三是字跡拙劣，與李氏親筆不同；四是題記行文蹩腳囉嗦，與《志玄安樂經》簡扼洗練的題記比較，顯非出一人之手；五是所用印爲藏書章而非私章，此又…不合理。

五個理由中，第二個最爲可議。原因是此有彼無，或此無彼有，未有固定脈絡可尋。若說《宣元至本經》有題記，而更完整的《大聖通真歸法贊》就應該要有題記，顯然太一廂情願；同理可論，《志玄安樂經》有李氏題記，又爲何被陳垣宣稱爲「世界僅存之景教《宣元本經》」卻無李氏題記？

雖然如此，其他四項論點卻仍舊不足以證明《宣元至本經》的題記爲僞。我們來看題記的三行原文：

景教宣元至本經卅行開元年號
此稀真品乃裱經背者余所發現
至足寶貴也〔註11〕

〔註11〕參榮新江，1999，頁78。